

逝者如斯。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真正的史家于叙事中藏奥赜，于白描中求深远。史心如鉴。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作者与作品和读者休戚与共，他依读者品性绽放自己的世界，或凭高远视，如君临万众，鼓其奋进；或俯视千载，如鸿鹄之鸣，声入寥廓。读者凭理解进入历史的时空，经验意义的真理和生活真理。他若与作者相通相契，在穿越历史的丛林时，自然可以听到逝者的歌唱：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我有诺言尚未实现，还需奔行百里方可沉睡。

逝者的意蕴

□王立志

约翰·埃德温·桑兹（1844—1922）长期在剑桥从事古希腊研究，自1903年至190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她的三卷本《西方古典学术史》，这部鸿篇巨制的问世已逾百年，此后的学者或删繁就简，或评论文史、各抒己见，然而就史料翔实这一点而言，桑兹之后，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典学术史在严格意义上是指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学术历史，在宽泛意义上也包括其后各个时代的接受史。桑兹的这部著作在广义上立论，这样，他就不得不与大量的文本搏斗，追寻古典著作的历史命运，寻找它们的接受痕迹。桑兹的这部著作秉承如下宗旨：古典学术用希腊拉丁等语言作为手段，以理解逝去岁月托留于我辈的文字遗产；其为符咒，从时间坟墓唤集千秋万邦之伟人的思想意绪；其为路径，自此追踪人类社会、道德、知识与宗教的演进。全书共六篇，按历史时期划分为雅典时期、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罗马时期的拉丁学术、罗马时期的希腊学术、拜占庭时期、西方中古时期。每一篇篇首的年表是作者叙事的总纲。这部巨著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囊括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语法学诸端，可谓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结构、感觉方式和体验方式。人类思想、情感、体验的历史“源头盲昧，活水奔流”。从何处开启古人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大门？如何展现古人内心生活世界的结构？我们如何

与古哲为友，与先贤同憩？这是桑兹的这部不朽之作要为我们解决的问题。历史学家通过运用自己“述而不作”的功夫，将文献资料编织成一幅“思想的织品”来展示历史上不同生活群体的精神风貌，真知灼见隐于织品精致的结构中。作品充实而有光辉，“光而不耀”者方为上品。桑兹的这部两次再版的《西方古典学术史》堪称此类佳作。

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从公元前600年的《荷马史诗》一直写到1453年突厥人征服君士坦丁堡。雅典、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君士坦丁堡、意大利是2000年岁月之流冲积成的“文化之洲”。这些“地方”曾经是进行符号性交换和文化创造之所，正因如此，它们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区域”而成为“文化地层学”意义上的一个“空间”。那个空间里装着古人的激情与梦想、沉思与希望。我们如何进入这个“探梦空间”？如何与古人体戚与共？学习古典的目的不是躲进故纸堆里成一统，不管冬夏与春秋，而是要温故知新，丰富我们当下的生活。假如我们对古人不信不好，那么我们当下的创造必然会陷入冒昧危险之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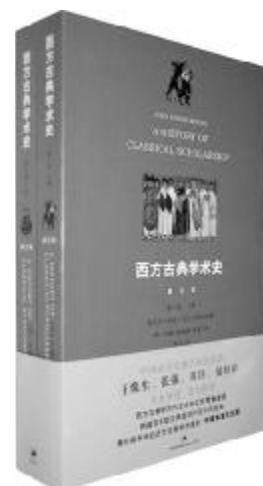
为此，我们就必须深入到文化地层的深处，沿着它的纹理与脉络发现它的内核，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剥离时代性的重“话语包裹”，洞见人类生活样态、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当我们从地层深处钻出，在时间结构里重新叠置这次“知识考古”之旅的收获，我们就创造了当下的新生活。要想使雅典、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君士坦丁堡与我们发生密切的

关联，我们就不能单在“空间里游牧”，而且要在“时间里游牧”。读者作为“思想的牧民”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游牧生活过得充满生趣呢？通过阅读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得到些启示。

藏诗心以入史境

诗的气息救活了19世纪的历史研究。曾经是苍白无趣的东西，诗让它变得生动形象；曾经是冷冰冰无生命的东西，诗让它恢复温暖和生机。桑兹的这部不朽之作就是在这种精神氛围中完成的。了解这一点是理解桑兹鸿篇巨制的基础。桑兹在第一编第一卷——雅典时期（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中关注到了以下六个主题：史诗、抒情诗、戏剧诗、修辞学的兴起和散文、语法学和词源学的发端。史诗、抒情诗、戏剧诗是雅典时期人类感情和思想的独特样式。诗是人类心灵的初级形式。没有诗，思想就不能产生；没有诗，就不可能有哲学，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

《荷马史诗》就其表达了希腊文化传统的雄心壮志而言，它是诗；就其被当作实际事件的叙述而言，它是历史。这正是自雅典至今对荷马的学习从未间断的原因。桑兹没有讨论荷马是谁，也没有讨论《荷马史诗》的内容，而是记述了荷马如何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希罗多德的“历史”、色诺芬的“回忆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中。桑兹假定读者已经熟悉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作品，其中的情节与人物都已装在读者



《西方古典学术史》，[英] 约翰·埃德温·桑兹著，张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0月出版，定价：88.00元

心里了，他把荷马史诗当做人类精神产品的早期形式看待，在这里“史”和“诗”是融为一体的。“诗”代表着人类知识的想象性，“史”代表着人类知识的客观性，两者都是真实的。“诗”所要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史”所要描述的是已然发生的事，“史诗”代表着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统一。从桑兹的叙述方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写作《古式学术史》是以人类的精神创造物在历史中的传承为线索的，通过考察“创造物”的变化，研究人类文化的创造过程，这是桑兹的史学方法论。

语言是活生生的，它是人类创造的符号系统，它处于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它既是人的创造物，也是人存在的边界。当桑兹接下来叙述修辞学的起源、文体的演变、语法学和词源学的发端时，上述的方法论原则得到了具体的运用。讲到底，这三个方面是关于人如何、从何处塑造自己的问题。桑兹的这种叙事方式是一种指引，它让那些从资料堆中抬头远望的读者看到了一条以语言为主线的人类创造自身的路。

窥细节以悟大体

桑兹着力于构筑人类知识仓库的语言，他注重文献和遗迹，出言必据，这样一样，你不可能快速地阅读他的这部著作，因为每一个章节都由众多的引语精心构筑而成。这些引语是作者对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条分缕析，仔细甄别、反复考辨的结果。读这样的书，你就像跟着一个考古学家，发掘历史遗留的断简残篇，拭去上面的泥土，通过猜测、想象、推理复活一个往昔的生活世界。

公元前300年前后，希腊学术的中心由雅典转移到亚历山大里亚。桑兹围绕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建立和各位馆长的贡献来讲述这一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件。

公元前295年，德米特里乌斯向当时的埃及总督进言，建立亚历山大图书馆。有着帝王气象的亚历山大里亚取代了具有民主精神的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文学中心。与图书馆的生命历程紧密相关的是图书的命运和馆长们的功德业绩。桑兹对图书馆是否毁于战火进行了考证

考辨，对最早的四位馆长——芝诺多图斯、埃拉托色尼、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阿里斯塔库及其同时代的人物作了素描。

芝诺多图斯编撰《荷马史诗》字汇，整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校订赫西俄德的《神谱》、考证品达和阿纳克利翁的文本；埃拉托色尼是第一个以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地理学的人，他主张真正的诗歌旨在唤起想象而不是陶铸理智；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是第一位诗人兼学者的馆长，他把重读法和标点法简化为明晰的体系，编订了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的剧作，对柏拉图的著作进行了分期。他编纂了一部具有丰富方言知识的字典，把字汇编提高到了词汇编修的水平；阿里斯塔库是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在晚年从自己的门人中选定的继承人，他最早将话语分为八个部分——名词、动词、分词、代词、冠词、副词、介词和连词，为语法研究打下了基础，作为语法学家，他主张有规则的词形变化。

在这一部分，桑兹强调的是文明的内发式发展而不是外部交流。通过白描的手法，作者把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们注重诗人文辞的考辨之风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为我们勾勒了希腊黄金时代的文学传之后世的历史线索。从这些学者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模式和精神的脉动。

反诸己以知古人

读史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记住了多少史实，而在于你阅读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通过阅读，我们与过去照面，如何分享

历史的真理；过去和现在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张力，如何消解这种张力。显然，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古人那里而在我们自己。来者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此理亘古不易，其不同者只是形式。

希腊化时期，希腊语像今天的英语一样成为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通用语，罗马军团征服了希腊，把地中海变成了帝国的内湖。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拉丁语是罗马人在学习希腊语，把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希腊化到罗马帝国的兴起，人类文明发生了重大的转型，这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视域融合”过程。到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成为希腊文坛代表人物们向往的文化中心，拉丁语成为了人们塑造自身的主要方式，新一轮对自身构成方式的研究开始了，关于拉丁语的语法学、修辞学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无论经过怎样的劫难，人类从来没有放弃“人如何成为人”的探索。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出七种自由技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为什么会成为中世纪教育的基础，因为它们都与人塑造、生成自身有最直接的关系。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桑兹为什么从荷马开始写起，以彼特拉克作为《古典学术史》第一卷结尾了。因为荷马活在整个西方文化的历史中，彼特拉克是在意大利北方升起的文艺复兴的晨星。他们代表着人类历史创造的“重演律”。

在文明的进程中，人们不断地更新自我生成的方式，不断变换着自己生活的时空。历史中没有旧东西，只是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一颗善于同情理解的心灵。

重读周作人

□李元逸

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重版了余斌教授的旧作《周作人》，在那么多的周氏传记里，是字数最少的。像周作人这样的大家，写得多往往比写得少容易，懂得舍弃无疑是这本传记最大的好处。但简洁并不意味着简陋，特别是要在剖析传主复杂性时及的某几点新颖之处，虽点到即止但细究之下也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地方。

“三不”的产物

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周作人都算是个极其实的人物，又是个被誉为半的人物。周作人，浙江绍兴人。原名槐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果，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939年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建国后重新从事写作工作。

从这短短的几行平生中，我们就能看出他一生的跌宕起伏，他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史上的功绩是明摆着的，然而他在日伪时期又有过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这正是由于周作人这样的经历，使得作者有了诸多的思考。

10年前，当余斌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是一套面向中学生的中外名人传记的一部。当时余斌就在思考，是什么原因让周作人入选这样一套丛书的。毕竟周作人虽然还是个“名人”，但这个“名”在中国传统教育中，都是臭名昭著的“名”。不过后来，百思不得其解的余教授决定不再思索这些问题，而把精力放在对于周作人这个“老人”的“新说”上。



《周作人》，余斌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出版，定价：38.00元

不过碍于当时的形势，就像作者自己所说：“……这部小书是不许（‘通俗易懂’）的体例限制，不甘（不愿只是敷衍事迹，重复‘公论’），不能（做不到对传主的透彻理解）的‘三不’产物……”尽管如此，作者仍希望这本书能够使读者知道周作人这位现代文学史、现代化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了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荣辱浮沉，他的是非功过：“有些朋友读过之后以为还算可读，对周作人可知其大概。他们大多是周作人的读者，并非专家，其判断让我相信，以十来万字的篇幅，对周作人平生作尚不算公式化的交代，这书也许对传主不无普及之功。”

看到本次再版时余教授的自序，上面提到在本书最初写作过程中“当然也就未如我所愿，在书中夹带更多的‘私货’，即我对周作人的个人理解。一方面固然如上面所说，体例、对象、篇幅均不许，更重要的是我虽不甘俯仰随人，真正要做到对周作人深入的体认与把握，以我的知识储备与思考的力度，事实上却有所不能。读知堂越多，越觉其人不可测”。眨眼间10年过去了，这10年间无论是社会上的

主流历史观还是出版环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我相信通过这10年的研究，余斌对周作人的理解应该也有了新的认识。我没有读过第一版的《周作人》，不知道借助这次再版的机会，余斌有没有夹带更多的“私货”，有没有把当初没有理解透彻的问题再次解读一遍呢？

周氏兄弟

提到周作人，人们难免会拿他的兄弟鲁迅作比较。其实，周家兄弟无论在气质上还是学术上都有着天壤之别。曾经，与周作人在北大做过同事的温源宁这样描述他：“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恐怕很少有人会把他与“变旧造新”（唐孔颖达疏《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句：“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其族内叔祖就此为他改名”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与他相比，他的兄长鲁迅却给人留下冲锋陷阵，身先士卒的印象，精神气质上似乎更近于热爱新事物的青年人。

余斌在书中指出，这可能与周氏兄弟在家中的排行有关。首先，鲁迅是老大，责任心沉重，做的事情多显然也更具行动力。周作人身为二弟，从求学到工作，个人到家庭，无不得到长兄

的悉心照顾、操心的事少了，他那要自由、要潇洒的心理，也因此得到了莫大满足，再不必如兄长一般在现实生活的疲于奔命中消耗他的生命力了。其次，周作人是学者而鲁迅是小说家，论说文字与小说语言何者更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也同样影响了作者的心性。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周作人，看人看书看自己，多是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心态；而小说家鲁迅，因创作与现实的距离隔得太近，纵然写起杂文，也是事事关心，一样样关心的。

本书中，余斌通过对比一些诸如兄弟俩对于百草堂等事物的描写，很清晰地表明了兄弟二人在心境、文风上的不同。

周氏兄弟同为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又同为一流的作家和学人，世所罕见。他们之间早年的兄弟怡怡，至今令人称道。后失去和睦，成为莫大憾事。而后鲁迅英年早逝，周作人晚节不终，无论如何，这不是遗憾所能得了。

周作人一生坚信新时代的象征便应该是以人为本，这在当时无疑是最前沿的科学了，但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却未能避免为他带来一顶汉奸的帽子，其实，人生何其复杂，在“品”的高低上，即便是生活在思想已经大为开放的今天的我们，又多大程度能跳出传统的评价圈子呢？

余斌在书中指出，这可能与周氏兄弟在家中的排行有关。首先，鲁迅是老大，责任心沉重，做的事情多显然也更具行动力。周作人身为二弟，从求学到工作，个人到家庭，无不得到长兄的悉心照顾、操心的事少了，他那要自由、要潇洒的心理，也因此得到了莫大满足，再不必如兄长一般在现实生活的疲于奔命中消耗他的生命力了。其次，周作人是学者而鲁迅是小说家，论说文字与小说语言何者更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也同样影响了作者的心性。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周作人，看人看书看自己，多是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心态；而小说家鲁迅，因创作与现实的距离隔得太近，纵然写起杂文，也是事事关心，一样样关心的。

□金涛

《零度以下五十年》这本书放在书架上差不多整整十年了，最近翻出重读，感触良多。

本书作者查尔斯·布洛瓦（1863—1945）生于纽约，是美国早期在北极地区闯荡的硬汉。那时北极洋捕鲸带来的丰厚利润吸引了许多商人和船长，他们冒着恶劣天气、风暴和海冰包围的风险，劈波斩浪，前往阿拉斯加沿岸，参与捕鲸，与当地土著爱斯基摩人做皮货交易。查尔斯·布洛瓦年轻时在远洋船上当水手。20岁那年，参加一支煤矿

潘家园书话

北极的美国硬汉



《零度以下五十年》，[美] 查尔斯·布洛瓦著，姜德鹏译，作家出版社 2000年1月出版

勘探队首次进入北极，从此这个曾经梦想去热带非洲的白人青年，迷恋上了寒冷的北极冰原。除了短暂离开之外，他一生献给了北极地区，一直居住在阿拉斯加的巴罗角，娶当地土著人为妻，生儿育女，开创事业。他既是一位探险家、捕鲸者、猎人、商人，又是美国政府在爱斯基摩社区的代表。他的身上既有早期拓荒者的勇敢、无畏的闯劲，又具有善良、正直、热心助人的品质，这是难得可贵的。

多年来，他一方面热忱地帮助遇险的船员水手，为他们提供食宿，协助他们平安返回，救了不少人；同时也为引导爱斯基摩人走上文明之路，促进土著人社区的繁荣作出过贡献，被当地人誉为“北极之王”，为此受到政府嘉奖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接见。正如美国著名探险家和人种学家维赫拉姆·斯蒂芬森在序言中所说：“在过去五八年中，在位于北极圈以北大约五百三十二公里的地方，他一直敞开大门，迎接来自各方的人士。”

《零度以下五十年》虽然写的是个人的经历，却反映了美国阿拉斯加北极地区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以及一个过去鲜为人知的民族的兴衰。长期与爱斯基摩人朝夕相处，使作者有可能真实地了解生活在冰雪世界的狩猎民族。在工业文明尚未侵入原始的部落之前，他们的生活及风俗，他们的捕鲸方式、捕杀驯鹿、剥了它的皮，准备去抓另

外两头小熊仔，不料，“小熊一见他靠近就跑开，但并不逃走。于是，他就等着，找机会下手。两头小熊在一旁转来转去，最后，放大胆子，朝放在冰上的熊皮靠近。过了会儿，它们开始在皮上嗅来嗅去，寻找妈妈的奶头。它们没有吸到奶，便安静地躺在熊皮上休息。当他拖着熊皮开始回家时，两头小熊跟在后面，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当它们走累了时，就蜷缩在它们母亲的皮上，一起被拖着走……”这些震撼人心的镜头，是对人类滥杀野生动物最有力量的控诉。

当年白人的船只到北极捕

鲸，与爱斯基摩人捕鲸的目的是不同的，后者是为了吃，鲸肉鲸脂是土著人的美食，现在也如此。但白人捕鲸，是为了穿，主要是获取鲸须（生长在须鲸类口腔中的巨大角质薄片，柔韧不易折断，用以滤取水中的小虾、小鱼等为食物）。书中写道：“多年以来，鲸须的主要用途是制作女人的束腰，但是，如今妇女不再流行束腰了。而且，那些还在生产女人束腰的工厂，也不再用鲸须做材料了……”由于妇女时装的巨大变化，大约在1908年，鲸须从昂贵的抢手货变成无人问津的废物，从而导致捕鲸业的垮台。当然，这对于鲸的保护，是个好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译者姜德鹏是浙江电视台的资深编导，也是我国最早赴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拍摄地球“三极”电视片的制片人。据《译后记》，姜德鹏一行于1994年到达美国阿拉斯加的巴罗拍摄电视片，他的爱斯基摩人向导恰巧是已知的查尔斯·布洛瓦的孙子，并且沿袭了祖父的姓名。他将中国客人带到查尔斯·布洛瓦墓地，并赠送了英文版的《零度以下五十年》。这一